

中國哲學史：科學初視

馮友蘭 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馮友蘭編著

中國哲學史：科學初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

馮友兰編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8 3/4 插页 2 字数 198,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6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統一书号：11074·334 定价：(十一) 1.10 元

封面設計：任 意

前 言

这是为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介绍史料的一部稿子。原来计划要大加补充、修改，然后才出版。因为目前有更迫切的任务，这部稿子的修改、补充工作，暂时不能进行。可是，经常有人给我写信，询问学习中国哲学史要看些甚么资料。一一回答，势所不能；即回答也觉挂一漏万。因此，我觉得，先把它以初稿的形式印出来，或许能部分地解决一些同志有待于解决的问题。

同时我也愿借此机会，向专家和读者们请教，希望多多提出批评和意见，帮助我在日后补充、修改。

馮 友 兰

1962年6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史科学的范围和内容	1
第二章	論目录	10
第三章	奴隶社会时期(商至西周)的哲学史史料	21
第四章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春秋战国) 哲学史史料(一)	31
第五章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春秋战国) 哲学史史料(二)	44
第六章	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春秋战国) 哲学史史料(三)	57
第七章	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 (汉至晋)哲学史史料(一)	70
第八章	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 (汉至晋)哲学史史料(二)	88
第九章	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前期封建制发展时期 (汉至晋)哲学史史料(三)	99
第十章	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唐至清) 哲学史史料(一)	118

第十一章	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唐至清)	
	哲学史史料(二)	130
第十二章	后期封建制发展时期(唐至清)	
	哲学史史料(三)	146
第十三章	近代时期哲学史史料(一)	159
第十四章	近代时期哲学史史料(二)	176
附 录	《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参考资料	183

第一章 史科学的范围和内容

毛主席在1942年就說：“現在我們党的中央做了決定，号召我們的同志学会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对每一問題要根据詳細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来。这个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整頓党的作风》，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16—817頁）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研究任何問題，首先的要求，就是从客观事实出发，詳細地占有材料。这是研究工作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毛主席又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們說：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規律，作为我們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改造我們的学习》，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99—800頁）

馬克思是这样說的：“說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須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說明。不过，这层一經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經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們就好像是先驗地处理一个結

構了。”(《資本論第二版跋》，載《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17頁)馬克思在這裡所說的“說明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是一個研究工作的兩個階段。一個研究工作者寫出一種著作，表現他自己的看法，構成他自己的體系，這是屬於“說明”這一階段的。他的看法和體系，如果有科學的價值，那就不是從主觀想象得來的，也不是僅只從幾個原理原則推論得來的。在這個階段之前還有一個“調查研究”的階段。這個階段就是對客觀實際情況作周密的調查，詳細占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他的看法和體系，是他從事調查研究的結果。在調查研究的階段，需要付出艱巨的勞動。

總之，無論是處理實際的問題，或是作科學的研究，都必須遵照毛主席的一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791頁)。只有經過調查研究，在詳細掌握材料的基礎上，才可以作出正確的結論。

歷史科學所要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可是歷史的事實，都已過去了，歷史家所據以進行研究的材料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的事物和痕跡。例如商朝已經過去了，但是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東西，如出土的龜甲、獸骨，商代的建築遺址，以及古代歷史家關於商朝事迹的記載，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商朝歷史所根據的材料。這些材料就稱為史料。

史料學是歷史科學中的一個部門，為歷史學的研究作準備工作，是關於史料的方法論。

歷史學家研究一個歷史問題，在史料方面要作四步工作，每一步的工作都必須合乎科學的要求。

第一步的工作是收集史料，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全”。

第二步的工作是審查史料，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真”。

第三步的工作是了解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透”。

第四步的工作是运用史料，这一步工作的要求是“活”。

史科学的任务在于解决与前三个步骤有关的问题，第四个步骤已不属史科学的范围，不准备在这里讨论。

我们先谈关于收集史料的问题。

一般说来，史料分为两种：一种是某一时代所直接遗留下来的实物或者文字著作，这些都叫原始的史料。古代历史家对于某些事情的叙述或记录，跟原始的史料比起来，多经过一次转手。凡是多经过一次转手的史料，其可靠的程度，总比没有经过转手的史料差一点。但是如果作这些记录的人跟他所记录的事情发生的时代比较接近，也可以引为根据，用作史料，这种史料叫做辅助的史料。

研究中国哲学史所根据的史料也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的哲学家自己的著作，这是最可靠的材料，因为他用自己写的文章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材料就是中国哲学史的原始史料。另外一种是人关于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的叙述和记载。如果他们对于那个哲学家在时代上很接近，这些记载也可以作为研究那个哲学家的史料。不过他们的叙述，跟那个哲学家的思想，就可能有些距离。因此这些史料就是辅助史料。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哲学家本人没有什么著作，或是有著作而没有保存下来，那就只能依靠辅助史料了。例如孔子，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他就没有什么亲笔写下来的著作。我们研究孔子，主要是靠《论语》。其内容是孔子的弟子或是再传弟子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按说也是一种辅助史料。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论语》就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唯一的可靠史料了。又如战国时候，有一个哲学家许行，他没有什么著作，也许有著作而没有保存下来，只有

《孟子》书中記載了一点他的学說，这是关于許行学說的輔助史料，而且是未必完全可靠的史料，因为孟子本人是反对他的，可能夸大他思想中的缺点。但是我們对于許行思想的知識，沒有別的来源，因此这一种材料也就成为关于許行思想的唯一的史料了。又如，宋朝的朱熹著作很多。他的学生記載他的話，称为“語录”的，也很多。他的著作是他亲笔写的，語录是他的学生們記的。按說，他的著作應該是原始史料，語录應該是輔助史料。但是他的著作都是用文言写的，而語录是用白話記的。在語录中，有許多問題談得更細致、更清楚、更明确。因此朱熹的語录也就成了研究朱熹思想的原始史料了。我們研究宋、明哲学家的思想，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毛主席指出，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他說：“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則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認識开始于經驗——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實踐論》，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79頁）历史上的事情已經是一去不复返了，历史学家不可能对于它們有感性認識，这是沒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历史学家对于史料必須有感性的認識，那就是說，他必須直接接触到同他所要研究的事情有关的原始史料。他必須掌握它們，对于它們有丰富的感性認識，然后他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得到对于他所研究的事物的理性認識。不然的話，無論他作出什么样的工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

历史学家作研究工作，总要以最早的史料为根据。譬如战国时代发生过某一件事情，司馬迁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有記載。历史学家在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使用《史記》，不使用《資治通鑑》，因为《資治通鑑》也是根据《史記》而来的。——

只是有些晚出的史料，由于經過后人整理、考訂，比原始的資料更为翔实可信，研究者亦当斟酌使用。

历史学家收集史料，必須尽可能把同他所研究的問題有关的史料都收集起来。如果有較早的史料而他不知，却引了較晚的史料，这叫作“陋”。如果不自觉地引用了与他的結論相反的史料，那末他作出的結論就可能陷于片面。所以收集史料要求“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千多年来，遺留下来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其中哪些是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史料？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有些什么史料？到哪里去找？怎样可以找全？这些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首先所要解決的問題。这便是史料学的一个內容。

历史学家在研究一个問題的时候，首先是收集史料，下一步工作是审查史料。毛主席在《实践論》中指出，对于“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280 頁）。审查史料，就是对于史料做“去伪存真”的工夫。史料并不一定都是靠得住的，必須加以审查。

清朝学者崔述說：“諺云，‘打破沙鍋紋到底’。盖沙鍋体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达于底。‘紋’与‘問’同音，故假借以譏人之过細而問多也。然余所见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见有細为推求而僨事者。”崔述用“打破沙鍋紋到底”这句成語說明他的办事和为学的态度，这也是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态度。

历史学家讲述过去的历史，总会遇到这样的問題：“你怎么知道事情是那样的？”他必須随时准备回答这样的問題，也必須随时向自己提出这样的問題。

戴震十岁时候讀《大学》。朱熹的注說：《大学》的《經》是“孔子

之言而曾子述之”。他問老师，怎么知道是如此。老师說：“这是朱子說的。”戴震又問朱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說是宋朝人。他又問曾子是什么时候的人，老师說曾子是周朝人。他又問从周朝到宋朝中間隔多少年，老师說隔了几乎两千多年。他又問朱子怎么样知道是如此，老师沒有話可以回答。朱熹的話本是一种揣測之詞，並沒有史料上的根据，所以經不起戴震的追問。戴震的这种追問精神是可貴的，科学的历史必須能經得起象戴震这样的追問。

戴震的追問涉及到的問題，就是从史料的历史审查史料。这是审查史料的一个主要方法。

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主要是书籍。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保存下来的书籍，都有它們自己的历史，有它們自己的源流。它們总是經過一些发展变化，才具有目前的面貌。我們对于这些书的历史，必須加以考察，然后才能了解这些书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才能肯定它們的可靠程度。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我們要分析史料“不同的发展形态”。中国哲学史史科学的一个內容也就是要讲关于古代主要哲学典籍的源流，看它們是怎样形成现在的面貌的。

研究古代书籍的历史，是审查史料工作的一方面。审查工作还有其他方面。从一部书的語言、体裁上，从它的内容上，也都可以看出它的时代来。譬如說，现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論，我們一看就知道它是解放以后的作品。在解放以后，中国的語言和文章的体裁，有很大的变化；所討論的問題也大不相同。所以即使有專門伪造古书的人，把《人民日报》的社論刻成木版，用很旧的紙印出来，但是我們一看还是可以弄清它的时代的。

我們从史料的历史，从它的語言和体裁，从它的内容（包括所討論的問題和涉及的时事），都可以看出史料的时代。审查史料所

用的这些方面的証据叫“內証”，因为这些証据都包括在史料的本身之內。

此外，还可以从各时代的目录看。例如《汉书·艺文志》是西汉以前的书籍的总目录。如果有部号称先秦时代的著作，而其名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一著作的来源就很可疑。

哲学著作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一部哲学著作，都是哲学家参加当时的思想斗争的产物，所以必然要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中留下痕迹。一部特定时代的哲学著作，倘若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中没有一点痕迹可寻，这部著作的来源也就很可疑。

审查史料所用的这些方面的証据叫“外証”。因为这些証据都不在本书之內。

以前的人，特别是汉朝的人，喜欢“托古”。他们往往把自己的著作，托名于更古的权威。这不一定是有心欺騙，而是一时代的风气使然。也有人在編輯前人的著作的时候，无意之中把后人的著作編入，这是出于一时的錯誤。对于大量的史料，必須仔細审查，以鉴别其真伪。

判定史料的真伪，主要的是确定它的时代；这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不能混为一談。一部伪托古人的哲学著作，就其伪托說，是一部伪书；但就其具体内容說，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哲学史还要讲它，不过要放在真正产生它的时代里去讲它。

这些对于史料的“去伪存真”的工作，也是史科学的内容之一。

同样是真的史料，由于有着某些客观或人为的障碍，其价值也会大有不同。这就需要进行“由表及里”的了解工作。了解史料，首先要注意史料的阶级性。

阶级社会中的史料都具有鮮明的阶级性，特别是文字著作，我

們必須注意它是哪一階級的人寫的。在過去封建社會中，絕大多數的史料是統治階級和它的知識分子的作品。他們對於農民是蔑視的，對於農民起義說的話，絕大部分是誣蔑；他們偶或說些接近或符合事實的好話，然而實際情況往往比他們所說的更好。

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當時的紳士都認為是“糟得很”；毛主席查明，實在是“好得很”。毛主席指出所謂“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7頁）。認為農民運動是“糟得很”的人也有他們的“考察”和“報告”，其中充滿他們的階級偏見，這也是一種史料，但是這種史料只反映了當時反動派對於農民運動的歪曲看法，絲毫不能說明農民運動的真相。

我們對於史料作者在當時社會中的身分、地位，他的政治面貌及其學術派別，都要搞清楚。總之，不能認為，同一時代的史料，只要它們都出於同一時代的人之手，就必定有同樣的可靠性。事實並不這樣簡單，確定史料的不同程度的可靠性，也屬於了解史料的範圍。如上面所說的，這方面的工作的要求是“透”。

了解史料，還牽涉到語文學上的問題。

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的書籍，是不容易讀的。有些青年說，看古書就好象是讀天書一樣。其實，即使受過一般讀古文訓練的人，對於先秦的書，也還不是一看就能了解的。因為古代的語言和我們現在的語言有很大差別，所以我們看古書特別是先秦的書，得依靠前人所作的注解。但是一部書往往有很多的注解，特別是從前稱為“經”的那些書，例如《易經》之類，一部書可能有几百種乃至上千種的注解。究竟哪些注解是重要的，非看不可的；哪些是次要的，

仅供参考的；哪些是除非有特殊需要外是不必理会的。这些也都是問題。

一部书可以有許多版本。版本不同，内容便不一定完全相同；文字上有所差异，更是很普遍的现象。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首先应该知道，究竟要看哪些版本的书，哪些版本的书在内容上比較完整、在文字上比較正确。

这些問題也都属于了解史料的范围。解决这些問題也是史料学的内容之一。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的“研究”阶段中，究竟怎样收集史料，如何求“全”；怎样审查史料，如何求“真”；怎样了解史料，如何求“透”？回答和解决这些問題，就是史料学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論 目 录

哲学史的史料絕大部分是书籍。对于史料作初步的調查，要靠书目。从汉朝起，历代都有記載在当时和以前出现的书籍的目录。这些书目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官方藏书目录。在封建时代，有些統治者很重視收藏书籍。他們把当时的书籍收集起来，藏在他們的宮庭里，成了皇家图书馆。他們也經常派当时有名的学者，对这些书加以考訂、审查，做出一种目录。第二类是私家目录。有些私人藏书家，把他們自己所收藏的书作出目录；或者有些书籍爱好者，調查当时存在的书，作成目录。第三类是历史家所作的目录。在二十四史里，有几部史书載有《艺文志》或《經籍志》，把当时存在的书开列出来，編成目录，作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这一种目录往往是以上面所說的第一类或第二类的目录为根据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目录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一类的官书目录。汉朝历代的皇帝都很重視藏书，到汉成帝时，皇家所藏的书就很多了，汉成帝派了些专人来整理这些藏书。他叫刘向整理經传和諸子詩賦，叫任宏整理兵书，叫尹咸整理占卜一类的书，叫李柱国整理医药一类的书。其中有不少的书，刘向等人所从事的工作，实在是編輯。例如以前本来沒有《荀子》这部书，有的只是荀子及其后学所写的許多篇論文。刘向把它們編輯起来，成为《荀卿新书》。

每一部书整理或編輯完毕时，刘向就写一篇提要，称为“叙录”。許多篇叙录汇集起来，成为一部书，名叫《别录》或《刘向别录》。这种工作还未做完，刘向死了。汉哀帝就叫刘向的儿子刘歆完成他父亲的工作。刘歆在这个工作完成以后，作出了一个总目录，名叫《七略》。《七略》包括《輯略》、《六艺略》、《諸子略》、《詩賦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就是說，他們把当时所存在的书分成六类——經典、哲学思想、文学、兵书、占卜和医药，每一类都有一篇序和书名目录；所謂《輯略》，就是六个目录的总序。

在《刘向别录》里，每一部书都有一个叙录，說明这部书的整理或編輯經過，这部书的作者历史和它的主要内容，以及刘向对于这部书的評價。《七略》对于个别的书，只列书名和作者姓名，沒有叙录。《七略》是《别录》的节本。据《隋书·經籍志》所載，《别录》有二十卷，《七略》只有七卷，可见两者繁簡不同。这好象清朝的《四庫全书》，有《总目提要》，又有《簡明目录》（参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載《二十五史补編》第二册，第5頁）。

《别录》和《七略》还不仅是当时存在的书的目录。刘向、刘歆都是汉朝的哲学家和历史家。他們的《别录》和《七略》不仅是把汉代所存在的学术著作作了分类和記錄，实际上是把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作了分析和叙述，对于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的来源和流派提出他們自己的看法。所以《别录》和《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史史料。

《刘向别录》原书已經失传了，我們只能在某些古书中看到刘向所作的叙录。《七略》也失传了，不过它的基本部分还在班固的《汉书》里保存下来。《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抄录刘歆的《七略》，只是删去其中的《輯略》。有人說《輯略》並沒有被删去。在《汉书·